

◀ (上接4版)

利玛窦研究资料汇释梳理

宋黎明

利玛窦的称谓五花八门,其中“道人”尤其耐人寻味。利玛窦1595年春出韶州时,给自己所起西文称谓是“predicatore litterato”,直译为“有文化的传道人”,而据德礼贤的研究,其中文名称为“道人”,“道人”与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,对学界流行的利玛窦出韶州后由和尚变为“儒士”之说,提出强烈的挑战。

纵 观利玛窦研究资料汇释的历史,开山之作当为意大利耶稣会士汾屠立(Pietro Tacchi Venturi,1860—1956)所编《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》(*Opere storiche del P. Matteo Ricci S.I.,Macerata:F. Giorgetti, 1911—1913*)。上个世纪之初,为了纪念利玛窦逝世300周年,汾屠立在欧洲档案馆发现了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,以及利玛窦书信和同时代耶稣会士的相关书信,进而编辑出版了《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》。这部名著分为二卷,第一卷题为《中国札记》(*I commentarij della Cina*),即利玛窦晚年回忆录手稿,原题为《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》(*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*),从而取代了之前流行于世的金尼阁(Nicolas Trigault,1577—1629)拉丁文改编本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(*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*);第二卷为《中国书信》(*Le lettere dalla Cina, 1580—1610*),收录了利玛窦以及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,其中利玛窦书信54通。但是,汾屠立本人不懂中文,虽然得到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帮助,但利玛窦著述中的中国人名、地名

等无法甄别,书中多数内容也未加考证。

汾屠立深知其书缺陷,故力请正在中国的另一耶稣会士德礼贤(Pasquale M. D'Elia,1890—1963)返回意大利,继续深入利玛窦研究。德礼贤于1934年从上海返回罗马,经过十年的钻研,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对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的注释,并题为《基督教入华史》(*Storia dell'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,Roma: Libreria dello Stato,1942—1949*)。该书共有三卷,前两卷为利玛窦晚年回忆录全文以及注释,第三卷则为附录与索引。德礼贤给利玛窦晚年回忆录编号为NN.1—1000;另外的编号则是:NN.1001—2000为利玛窦书信,NN.2001—3000为同时代耶稣会士的书信,NN.3001—4000为年信之类的文件,NN.4001—5000则为其余各种杂件。换言之,这三卷本是德礼贤庞大研究计划的五分之一,而德礼贤给这个计划命名《利玛窦资料:有关利玛窦以及欧洲与中国早期关系的原始文件(1579—1615)》(*Fonti Ricciane: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'Europa e la Cina, 1579—1615*)。

尽管德礼贤没有完成后面四个部分的汇释,但第一部分的三卷本已经引起学界的轰动,该书充分利用了在罗马以及欧洲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档案材料,加上他从中国带回的地方志和文集等,甄别出利玛窦著述中多数中文人名和地名,并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精密的考证,学界誉之为利玛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。

近 日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汤开建《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》(2017)则是德礼贤《利玛窦资料》之后的一座新的里程碑。汤开建现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,长期致力于澳门史、中国天主教史、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,成果卓越。这次汤教授花费4年多的时间,专心收录从明末至清末的有关利玛窦资料,遍寻全球各大图书馆、各种数据库及各地私人藏书而成此巨著。汤著涉及400余种文献,录入资料达630余条之多,总计573页;全书分为《碑传》《序跋》《公牍》《述论》《诗柬》《杂纂》六卷,书末附有《征引文献版本》,全面展示了利玛窦的生平事迹、著述思想以及在中国的深远影响。汤开建《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》的问世,标志着利

玛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

在汤著之前,有两部相关作品值得一提。本世纪初柯拉迪尼(Piero Corradini)主编了新版利玛窦著作集,包括利玛窦晚年回忆录,恢复了利玛窦手稿原名,即《耶稣会和基督教进入中国》(*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, Macerata:Quaderni Quodlibet, 2000*),以及《利玛窦书信》(*Lettere, 1580—1609, Macerata: Quaderni Quodlibet, 2001*)。出版这部著作的主要动机在于读者要求,因为汾屠立《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》以及德礼贤《利玛窦资料》早已绝版。该书在注释方面则乏善可陈,甚至比德礼贤有所退步,故学术意义不大。与此同时,朱维铮主编《利玛窦中文著译集》(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1年),实为利玛窦中文著作汇编的开山之作,但它并非利玛窦著作的全部,其中缺少《几何原本》正文,而且版本选择欠精,注释亦简,故需要改进。因此,这两部著作虽然比较重要,但并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笔者将汤开建《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》

(下转6版) ▶

行简。至国初,费氏入上海市文史馆为馆员,1988年印行的《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名录》有其小传云:“费行简(1872—1954),别名敬仲,四川阆中人,1953年6月入馆。曾任上海仓圣大学教务长。”所据当是其入馆时所填履历,疑信参半,难以细究。

第二札末书“名正肃”三字,大约信封上是署真名费行简,不知此信封仍存国图否。要之,这位归安费行简,在仓圣明智大学中易名孙学谦(仲约),撰述部时署名沃丘仲子,后又恢复原姓名,其人之行藏出处,颇为逶迤神秘,但与王国维在爱俪园中同事数年则无疑义。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中两封“阙疑待考”的信俱为费行简所写,可以确定。

写于2017年12月16日,旧历丁酉十月廿九,适为王静安先生百四十岁诞辰,谨以此文为纪念。

附记:文甫草就,复检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,见庄肇一关于费行简事致王国维一札在焉,其全文如下:

静安先生侍教:昨奉手示,拜悉。仲约先生现寓东四牌楼北七条胡同王怀庆住宅,闻更姓费润生,系代表四川边防督办来京出席善后会议。如先生前往会晤,请勿以原姓号访之也。谨以奉闻,肃敬岁祉。教晚肇一顿首。廿八日。

所谓善后会议,指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在1924年11月21日通电全国:“现拟组织两种会议,一曰善后会议,以解决时局纠纷、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,拟于一个月内集议,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。二曰国民代表会议……”北京政府之《政府公报》第3157期载“四川刘督办冬电(1925年1月2日)”云:“执政钧鉴:召集善后会议,职处已派费行简为全权代表赴会。”刘督办即刘成勋,时任四川边防督办。2月2日费行简已在北京,曾往东站迎接孙科到来(《中报》2月10日)。庄肇一此信当作于1925年2月20日(旧历正月廿八),时未出正月,故札尾敬语仍用“岁祉”,与第二札云“前岁来京”,时间亦相合。“润生”当是费氏更姓后之表字。由此札可知,费氏抵京不久王国维即已知之,而费氏会后并未返沪,滞留北京两年,其间双方未及晤面,直至1927年初费行简乃致书王国维,直接表达拜访之意,是否得到回复,是否成行,不得而知。三个多月后,王国维自沉昆明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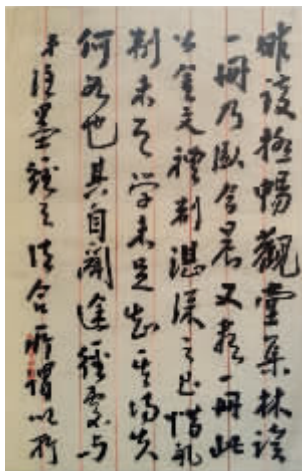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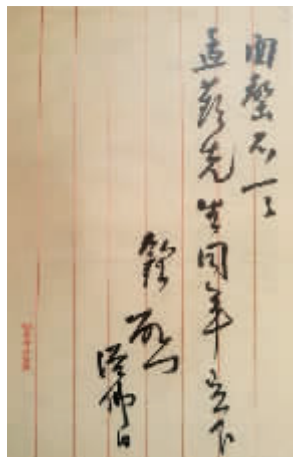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有关王国维的一通张其铨信札

印晓峰

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收有一通所谓“杨杏佛致蒋汝藻”书札(2282页),略云:“弟于《墨经》有数字灼知其误,且知当为何字,而不能举例证明。兹举于别纸,乞代求教于静安先生。如能开示,所裨多矣。他面罄,不一。孟蘋先生同年足下。”揆其文意,与杨杏佛何涉,盖编者误认落款一字为“铨”,乃径归于杨铨(杏佛)名下。此字实为“铨”。同册中蒋汝藻(孟蘋)致王国维一札有云:“张君子武深佩大著能自闢涂径,每次晤谈,辄询有无通讯,有无新著作。

渠于《墨子》精研多年,注已脱稿,尚在修正,有数疑问,至今不得甚解,屡囑代求教益,辄以事冗遗忘。前日赴汉,濒行又来询及,愧无以对。兹检出来函及欲问之字二纸,一并附呈。”(2268页)据此可知写信人为张其铨,字子武,广西临桂人,与蒋汝藻同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举人,故以“同年”相称。张其铨次年会试成进士,民国初任湖南军事厅长,1914年至1917年间曾息影沪上,研究先秦诸子,于庄、墨尤有心得,结识蒋汝藻当在此时。后任广西省长,又随吴佩孚征战,1926年7月卒于阵中。所撰



落款一字非“铨”,实为“铨”。

《墨经通解》《墨子大取篇校注》之一名义刊行,梁启超为撰长序,称“二千年来不可读之书,至是盖十通八九”。